五台山那些神奇往事

贺捷生

省上接待我的同志说,大姐,来一趟山西,上五台山去看看吧。我说我不是第一次来山西了,五台山的寺庙都看过。那同志说,“行宫”你也看过吗?我一时没有转过弯来,疑惑地问,什么行宫?谁的行宫?那同志忽然意识到什么,言辞吞吐地说,哦,林彪的……

林彪在五台山修“行宫”,我很早就听说过。如果猜得不错,那同志欲言又止,肯定是想到“文革”中,我父亲贺龙被林彪和“四人帮”迫害致死,怕我触景生情,心理受刺激,因此话说半句又咽回去了。我连忙说,我去,历史本来就是这么写的,去看看又何妨?

接着坐下来聊天。我说,林彪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注定要给历史留下话题的人。事后人们回想起他的相貌,觉得他脸色阴沉,眉毛总是拧成一个疙瘩,说起话来带着一种有气无力的颤音,说他早就露出了阴谋家的迹象。我觉得这有失偏颇,起码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我在军事科学院长期主持军事大百科编纂工作,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有如何评价林彪。为此,我曾带领同事访问过几个当时尚健在的老帅。老帅们说,对林彪也应该一分为二,功是功,过是过,否则就不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对历史也不负责任。他最后叛国逃亡固然有罪,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员战将,打了许多胜仗,这是有目共睹的。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在写林彪条目时遇到的疑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后来出现的许多影视作品,比如由中央确定拍摄的革命战争史诗影片《大决战》,就比较真实地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没有丑化他,也没有给他戴上阴险狡诈的脸谱。

林彪与我父亲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水火不相容。南昌起义时,我父亲任起义总指挥,林彪不过是个连长,按照军队森严的等级观念,他们是不可能认识的,即使见过面,也隔着很远的距离。这之后,我父亲和他一直没有共过事,只是彼此知道对方。毕竟是同一个阵营,尽管两个人性格迥异,但还是能友好相待。一九三八年二月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在洛阳召见第二战区师以上将领,在同回部队途中,林彪直言不讳,对父亲说了几句蒋介石的好话,还把一张蒋介石还是有抗日决心的字条交给他,说明林彪当时是信得过我父亲的。延安整风时,风声鹤唳,两个人话不投机,从此父亲便觉得此人难以捉摸,需要提防。十年动乱期间,林彪终于等到了机会,将我父亲置于死地。电影《元帅与士兵》披露过一个真实细节:父亲在被关押期间,用手杖指点着林彪的头像说:“对你这个人,不是我看错就是主席看错。我看错不要紧,主席看错了就坏了。可我没有看错你!”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在我父亲被迫害致死两年后,林彪“折戟沉沙”,在出逃中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接待我的同志听见我说这席话,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了,车就在这种轻松恬淡的气氛中上路。

从太原上五台山,路不算近。而且由五座山峰环抱的这个宗教圣地,横跨数县,周围达二百五十平方公里,需要走几十里山路。为驱除路途的枯燥,绕来绕去的话题,又绕到了林彪修的“行宫”上。

林彪的这座“行宫”建于一九七〇年,当时他正扶摇直上,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帅被他整死的整死,赶走的赶走,基本清除了他抢班夺权的障碍。但在这时,他的野心也开始败露,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支工程部队神秘地开进了五台山,为林彪修筑这座同时也可以作为军事指挥部的“行宫”。那时的寺庙都贴上了封条,被当做“四旧”或“封资修”的东西,再没有人来烧香朝拜了。施工部队悄悄拆除了原有的五郎庙,在此大兴土木,明修栈道而暗度陈仓。也许时间比较急促,据看过“行宫”的人说,“行宫”修得并不豪华,用现在的眼光看,甚至有些粗糙。修好后林彪也没有来看过和住过。让人看不懂的是,五台山的地方这么大,完全没有必要占用五郎庙的位置;从地形上看,五郎庙也非隐蔽之处,有无数的人曾光顾此地,在这种地方建“行宫”或军事指挥部,明显犯了兵家大忌。正因为与情不符,与理不合,当林彪在一年后自我爆炸,老乡们便以自己的看法来解释这一谜团,说林彪拆了五郎庙修“行宫”,是伤天害理,得罪了杨五郎的英灵。又说,人家杨家将在大宋能征善战,是历史上的功臣,你林彪凭什么要拆他的庙,让他给你让地?因此,最终遭到了报应。

这些说法虽然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反映了老百姓对林彪的不满和不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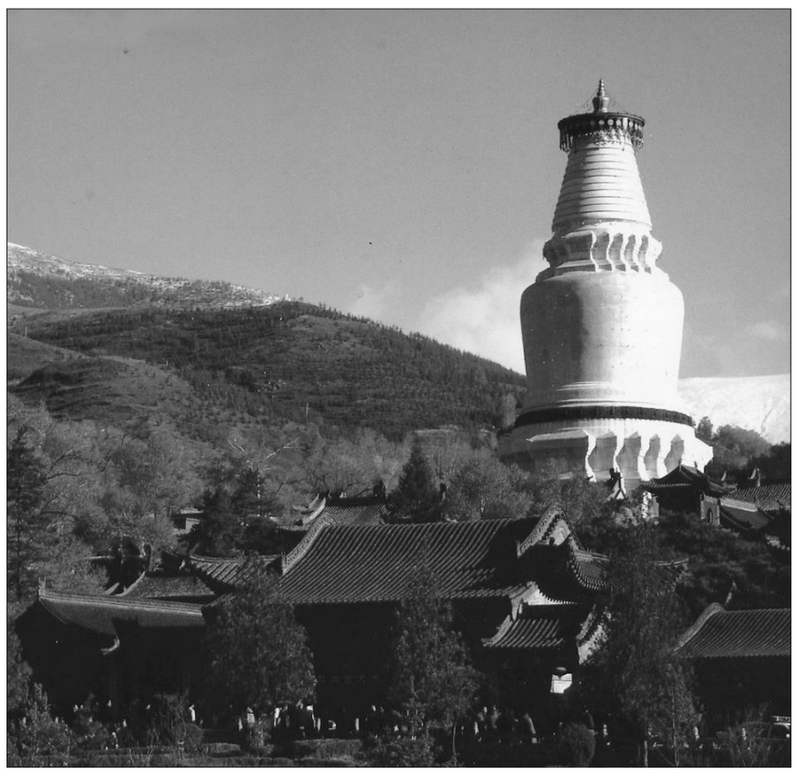
车至台怀镇,前去联系参观的同志回来对我说,大姐,“行宫”正在维修,里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成了。我并没有感到失望,说不看也罢,不就是一个地下室嘛,有什么好看的?这时有人想缓和气氛,宽慰说,那一定是贺老总的在天之灵不让去看。我说怎么可能呢?我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他不会阻拦我们去看林彪的丑恶。

接下来故地重游,只能去看山上的寺庙。陪同我的人知道我熟悉党史和军史,从小又得到过毛泽东主席、聂荣臻和徐向前元帅的关爱,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都在五台山留下了足迹,甚至出现了许多民间传说,聊天的内容自然离不开这些话题。

先说到社会上曾广为流传“八三四一”这个数字。普遍的版本是,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路过五台山,特地进寺庙去抽签问佛。老方丈看完他抽的签,大吃一惊,说失敬失敬,施主洪福齐天,马上要当皇帝坐天下了;只提醒一句,未来必须注意“八三四一”这个数字,然后便三缄其口,什么也不说了。毛主席进城后,记住老方丈的忠告,将中央警卫部队命名为“八三四一部队”。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在党内矛盾重重中溘然去世,刚好八十三岁,主政四十一年,于是人们感叹“八三四一”这组数字的神奇,说当年五台山的老方丈一语成谶。

我与毛主席当年的卫士李银桥算是老朋友了,听到那些传闻后,想到我已去世的父亲那时也在山西,有一次当面向李银桥求证。李银桥说,哪有这么玄乎?纯属捕风捉影,添油加醋。

回头查党史军史,参照手头的一些高端访问笔记,我确信毛泽东当年过五台山的事是真实的,也确实与老方丈交谈过。那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告别住了十三年的陕北窑洞,率领党中央机关经晋西北、晋东北,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挺进。这是党史军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中国革命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到达山西兴县,我父亲率晋绥边区各界领导人集体相迎,将他们接到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所在地蔡家崖。在这里,毛主席听取了我父亲的工作汇报,对后方根据地建设和晋绥地区土改进行了详尽了解和调查,肯定了成绩,提出了问题。四月二日,毛主席同《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举行座谈,勉励他们办好党报,切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篇著名的谈话收在后来出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中。四月四日,毛泽东一行离开兴县,一路东进,于四月八日到达五台山地区的杨林街村。次日傍晚大雪纷飞,满山皆白,把道路埋得无影无踪,走在半途的毛泽东一行,临时决定在台怀镇的塔院寺方丈院投宿。



五台山

李银桥告诉我,五台山的夜晚寒风割面,气温很低,四月飘雪的奇观让他们大开眼界。但当时国共两党的战争正进入高潮,稍有头脑的人都在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寺庙里的方丈看见来人气宇轩昂,前呼后拥,还有那么多带枪的警卫,自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偏偏毛主席又有随时随地搞社会调查的习惯,当晚他一边用饭,一边烤火,一边和方丈交谈,显得轻松自如,从容淡定。不过,毛主席和老方丈交谈的内容,基本上是随情所至,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至于抽签问佛,还有老方丈对毛主席说出什么神秘数字,那就纯粹是杜撰了,连他们这些当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都闻所未闻。

我相信李银桥的记忆不会出现重大偏差,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疑问。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耳闻目睹,每个人看到的真相也会有所不同。说到毛主席在五台山的这些传闻,我想,问题可能出在方丈们的自然联想和不断的转述中。因为方丈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势神化毛主席,是件并不奇怪的事。想想也不难理解,毛主席身材高大,相貌俊朗,对当时的形势发展胸有成竹,那种谈笑中灰飞烟灭的气度,必定给方丈们留下深刻而又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当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从寺庙里传出的轶事,难免不打上神奇的烙印。

还有一点,山西是八路军抗日主战场,五台山也是著名的老抗日根据地,在它方圆几百里的山山岭岭中,曾留下无数老共产党人的足迹。他们那过人的智慧和胆魄,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本身就充满神奇色彩。后来经口口相传,逐渐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说。

在大孚灵鹫寺,我们听到导游绘声绘色讲述的聂荣臻元帅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台分兵”的故事,就很说明这个问题。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平型关战役之后,当时,由聂帅任副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九师在五台县兵分两路,一路南下,一路仅三千人,由聂帅亲自带领西进太行山。作为抗战的大手笔,聂帅就凭着他带领的那区区三千人,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在几年间开辟了幅员辽阔又威震四方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上演了包括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的许多战争活剧。我们看到的那些黑白片抗战老电影,如《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讲述的便是这支部队创造的奇迹。

但导游给这个故事添加了一个插曲,一个很为五台山增色,也使她的解说分外精彩的插曲。她说,一九三八年六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同国际友人白求恩的谈话中,告诉即将去晋察冀救死扶伤的白求恩,中国有一部著名的古典小说叫《水浒传》,《水浒传》里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是晋察冀。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他在大闹五台山。

听完这个插曲,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虽然我知道这个插曲基本可靠,但其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来自于前些年那些畅销的红墙纪实文学,而这类作品通常都有演义的成分,免不了亦真亦幻,杂树生花,但人们就是爱看,爱听。仔细想来,这反映了人心向背,天地良知,至于接近事实真相的程度,似乎变得不怎么重要了。

在五台山流传的徐帅和阎锡山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个道理。

人人都知道,阎锡山曾是山西的土皇帝,号称山西王。有意思的是,阎锡山出生在五台县的河边村,徐向前出生在永安村,两地相距仅十八里,阎锡山又刚好比徐帅大十八岁。当年阎锡山和徐帅不仅相识,而且有一定的交情。但导游接下来的解说,就有些人神不分,信不信由你了。

导游说,阎锡山的母亲是在梦游灵鹫寺时生下的阎锡山,而且直接把他从梦里抱出来。后来阎锡山成了自命不凡的山西王,把他母亲的梦当成在现实中发生的事,说他是神灵转世托生,被派来拯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他提出的治国思想名曰“圣王之治”,说到底,是要人们相信由他来治国,就是“圣人治国”。

你相信阎锡山是神灵转世,是中国的“圣人”吗?

但有资料证明,阎锡山当年曾资助过徐帅读书,对他非常器重。他觉得这个比他小十八岁的同乡,年少志大,聪明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只要加以培养,将来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没想到阎锡山还未提携徐帅,这个两家相隔十八里,比他晚出生十八年的小老弟,便不辞而别,南下广州投了黄埔军校,然后又跑到他的对手共产党那边去了。徐帅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后,阎锡山大发感叹,说我们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在共产党一边。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有一次阎锡山见到徐帅,还热情地和他套近乎,说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对你的家人怎样?我可不是蒋介石,六亲不认,我阎某人是对得起乡亲的!出乎阎锡山意料的是,一九四八年,徐帅作为统帅之一的那支军队,宜将剩勇追穷寇,把阎锡山赶到孤岛台湾去了。到这时,阎锡山就只有仰天长啸了,说他本来是不会失败的,无奈与徐向前同生在五台山,两人命里相克,让他逢“八”必败。

“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本是个吉祥数字,不知为什么到了阎锡山身上便成了他的灾星。这只能说造化弄人,五台山的神灵也信奉“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是谁也无可奈何的。

因为徐帅是五台山人的骄傲,当地老百姓对他格外崇敬,所以关于他的轶闻和传说,长盛不衰,以至与时俱进,不断出现新的内容。

和我们一起上五台山的一位同志,在车上说了一件他亲身遇到的事情,竟也带着几分神奇。这位同志说,一九九八年年初,他下到山西某地的一个部队,有个熟人热情邀他上五台山。当他们抵达五台县城时,这个熟人突然心血来潮,说不想去朝佛了,于是一车人跟着他打道回府。返程走了数里,路边闪过一块“徐向前元帅故居”的牌子。和我们一起上山的同志当即问他的熟人,徐向前的故居在哪里?对方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从未去过。和我们一起上山的同志当场揶揄他的朋友说,你这个同志,来当地任职五年了,连徐帅的故居在哪里都不知道,失职啊!又说,你小子只想着如何提升吧?心里没有徐帅的位置,徐帅的英灵怎么能容得下你?那熟人一时语塞,满脸通红。蹊跷的是,数月过去,这个熟人朋友负责的辖区出了一个事故,他最终受到追责免职处理。

听完这个故事,一车人无语,都陷入了沉思。

我心里想,说徐帅的英灵导致那个责任心不强的朋友丢官,当然牵强附会,我们不必信,也不能信。再说,即使徐帅在天有灵,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对待同志。可听起来没有道理的事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虽然共和国已经创建六十多年了,但我们这些后辈,尤其是后辈军人,对徐帅这样的开国功臣,这样的老革命家,老军事家,理应保持足够的敬意。当今社会扰扰攘攘,许多人被商品大潮冲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有今天,怎么走到了今天,这是一件多么让人痛心的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应该有自己的灵魂,有清醒的历史记忆的。如果记忆中的历史是模糊的,可有可无的,何以谈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何以谈走向未来,走向新的崛起和强盛?

从五台山下来,品味流传在山上山下的那些高层往事,实话说,我并不觉得有多么神秘,也不觉得有多么奇幻。相反,倒觉得那个年代其实离我们很近,那些人离我们也很近,仿佛触手可及。因为那个远去的年代,那些其实也很普通的人,已经活在老百姓爱憎分明的口碑中。

鲁迅(版画)

鲁迅晚年为什么不回故乡

张映勤

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鲁迅应该也和别人一样,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深厚感情,他在后来的许多散文中总是回忆着少年时期在绍兴的生活,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朝花夕拾》中,但是他同时又在避讳着绍兴,警惕着绍兴,表现出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鲁迅一九一九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直到一九三六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七年里始终没有回过老家。自从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和许广平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距离绍兴,大概一百四十公里,这点距离即使在交通不算发达的当年,也不足以成为鲁迅不回绍兴的理由。

鲁迅在感情上与故乡产生隔膜,甚至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这里面除了绍兴师爷、刀笔吏这种名声让他忌恨以外,还有他痛苦的少年经历造成的巨大阴影,让他对家乡和家乡人产生一种憎恶心理。但是他晚年始终不回故乡,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内中隐情。

首先,我以为,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原因与他的夫人朱安有关。朱安也是绍兴人,家庭富足,名门之后。她是鲁迅本家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孙女,媒人又是周玉田的儿媳妇谦婶,婆媳俩和鲁迅母亲的关系很好。

众所周知,鲁迅的这一段婚姻是失败痛苦的。朱安不仅大鲁迅三岁,而且身材相貌超出了自己能够接受的底线,让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两人形同路人,有名无实。对鲁迅不喜欢妻子朱安,许多人为尊者讳,说是因为朱安是一个旧时代的女人,不识字,缠小脚,和鲁迅没有共同的理想志趣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我以为还是因为朱安不漂亮,缺乏女性起码的魅力。朱安的外在条件鲁迅在婚前并非一无所知,但是他和朱安未谋一面,婚前也许还心存幻想,觉得以母亲的眼光为他找的妻子应该能够让他接受,但是没想到新婚之夜看到的朱安瘦小枯干,面色黄白,尖下颏,薄嘴唇,宽前额,有些发育不全。鲁迅心里的苦恼和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但凡他对妻子有一丝好感,二十六岁的新郎不会在新婚的第四天就抛妻别母,与二弟周作人远赴重洋,返回日本。

从日本回国后,一九一〇年九月,鲁迅回到绍兴担任中学堂教员兼监学,他这时的状态是:囚发蓝衫,喝酒抽烟,意志消沉,荒落殆尽,其内心的痛苦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长期住在学校宿舍,尽管离家并不很远,走路只需几十分钟,但鲁迅每周只回家一次,主要是取些书籍衣物,看望母亲,对妻子朱安几乎不闻不问。一旦有机会他一定会逃离家乡,以躲避痛苦的婚姻。果然,一九一二年二月,他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第二次离开故乡。

这之后,鲁迅在北京最终与许广平相恋,两人几经周折,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上海共同生活。

鲁迅在感情上从来没有接受过朱安,这个可怜的女人为鲁迅守了一辈子活寡。就两人的婚姻而言,朱安无过错可言,此中的是非我们不去管它,问题是,绍兴不仅促发了鲁迅一段恶梦般的痛苦婚姻,还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共同故乡,在鲁迅的感情生活中这无疑是一处伤心之地。离开家乡另组家庭的鲁迅如何面对,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回避。试想:鲁迅的亲戚朋友、同学乡里,朱安的娘家亲人等等都在绍兴,假设鲁迅回去,以他当时的状况,自己或朱安的亲友问起家里情况,问起朱安,鲁迅会如何作答,以鲁迅的自尊自重,这个尴尬的话题实在是难以面对。

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再一个原因,我以为还和他的家庭、兄弟有关。

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迅速败落,少年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在《呐喊自序》中,他谈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的鲁迅一度生活在紧张焦虑惊悸的状态中,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经济压力,更是精神上的压抑。请注意这一句话:“在侮蔑里接了钱……”我以为,让鲁迅感到侮蔑的决不仅仅是质铺里的伙计,也许还有周围数不清的熟人,甚至是同族亲人。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一房长孙,称祖父还在狱中,坚决不肯签字,由此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记载过这件事:“鲁迅往南京前一年间,……和本家会议本‘台门’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更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鲁迅接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北上。年初的时候,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三百五十八页)变卖绍兴老屋是因为“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这里面很可能与族人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鲁迅居住的新台门都是他的本家亲戚,却也因为家庭的变故,变得冷酷和势利起来,这不禁让敏感的他对家乡人产生一种感情上的憎恶。变卖新台门周宅,接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同住于八道湾,他在绍兴几乎没有情感牵挂与依恋之人,绍兴自然没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

再说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二人分别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两姐妹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一九一二年五月分别在绍兴生活八九年之多,并各生育三个儿女。兄弟俩娶日本姐妹俩为妻,并且生儿育女,这样中外合璧的家庭在一百年前的绍兴城肯定是轰动一时,备受乡邻亲友关注的。可是,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手足情断;一九二五年离开北京妻子儿女的三弟周建人也像大哥一样,在上海重组家庭。绍兴不是鲁迅一个人的家乡,与三兄弟及其妻子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到绍兴,自然无法回避相关的话题,而这些家庭的重大变故及个人隐私,都是鲁迅对家乡亲友不愿提及的,索性不如避而不回,把绍兴留在记忆深处。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晚年不回绍兴有着复杂的难与人言的个人情感因素。

绍兴鲁迅故居